

因为他们，社会前进不可逆转

——关于小说《不可逆》
孙颢

说：“外国老板重用我们，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太好，哪天市场不行了，可能立马不客气地解雇我们。”我不知道他的年薪到底是六位数还是七位数，我佩服的是他拿着外国公司的高报酬，却保留着自个清醒的意识。他的忧国忧民，与个人的利益高度吻合，显得十分自然得体。

我不由开始十分关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

当多数年轻人还在为生存而苦苦奋斗的时候，他们中的精英，已经开始了充满个性的里程。你得承认，任何年代、社会均生产精英，区别仅仅在于，精英涌往哪个方向。有一点大致肯定，中国的青年精英们，面对的世界很精彩，不会再去挤文学的独木桥了。

我关注到一些特别的个案。在四十上下的成功人士中，有人反复遭受挫折而依然不认输，从零开始，顽强创业；有人挖得几桶金后，长期投身穷山僻壤慈善活动——不是送点钱了事，而是努力帮助那里的农民脱贫致富；有人获取个人财富自由后，放弃高薪高职，回到学校里参与教育孩子们的事业。同时，我也从媒体上获悉，中国硕果累累的科技创新，正极大地依赖这批获得过国内外高级教育的年轻人！

我不是写社会调查报告，我不需要一一罗列材料，我要回到文学的本义。我没办法抽象阐述这代人，我只需要描绘出他们中的若干人物。反复酝酿，从小一起玩篮球的三兄弟诞生了。为了打开作品视野，三兄弟被安置于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和家庭背景：一个是身在美国风头正劲的律师，其父却是突然被双规的中国官员；一个是雄心勃勃的民营企业企业家，他的老爸是曾被判刑的“文革”造反派司令；第三个则是儒雅智慧的大学副教授，继续行进在他的知识分子家族的道路上。至于设计出把他们纠缠到一起的好看故事，一场争夺民营企业控制权的阴谋，经验丰富的读者自然懂，那是小说作者屡试不爽的手段。

写到这里，我想已经把创作的冲动说明白了。所谓“男人四十”，并非要表现男士们情场逐鹿，而是速写当下部分壮年男子的生态和面目，写他们的奋斗与焦虑。

那么，我为什么用了《不可逆》这样一个题目呢？

小说的构思，是复杂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反复过程。当人物故事大体就绪，对人物身上的意蕴的挖掘，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写小说，构思的工夫远多于落笔的时间，一个原因就是想要挖掘点别样的意思。我前面说过，这几个人物，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表现过的。那么，除了年龄的区别，与父辈们比较，更重要的不同在哪里？

我渐渐想清楚了。他们是随改革开放年代成长的一代，尽管家庭的命运，会把三兄弟牵扯进消逝的历史，但他们并无亲历既往的包袱，相对超然，小说中的副教授就说过：“老想父辈的事，累不累？”他们是远比我们轻装前进的群体，他们始终是脚踩当下而追逐明天的一代。偶然回眸一瞥，仅仅是感兴趣于前辈的心得教训。他们受教育充分而全面，自信满满；经历过市场的摸打滚爬，能横看世界，远望未来；他们已经悄悄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成长，也回答了改革和转型会不会逆转的疑问。这代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就绑在由 1978 年启动的列车上。小说中的三兄弟，无论是投身创办企业，还是参与学术研究，或者是远赴海外求学，他们的青春生命，穿越了改革年代的风雨，与新生的市场经济一路同行；吃苦也罢，遭难也罢，血脉相连，难舍难分。他们的思维方式，感情色彩以及利益诉求，成为中国现实土壤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群体在埋头推动车轮，社会转型，便不可逆转。于是，小说的意蕴开始在我心底呈现，故事与人物形而上的灵魂，飘荡在字里行间。

这大约就是鼓励着我把不太熟悉的故事讲述下来的激情。言犹未尽。也许，我还会继续写三兄弟的故事。

（作者为知名作家）

最近，我在《收获》上发表一部中篇小说，标题有些拗口，《不可逆》。刊物出版时，《收获》的微信公众号约我写篇心得，顺手写下个标题《男人四十》。很快，有朋友对我说，后面这标题，用在小说上多好，明亮多了，抓眼球呢。

这里，就来谈谈两个题目的不同用意。

新创作的中篇小说，有三位男角色，三位老同学，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与人生起伏中，互相依傍与扶持，有人称，是写了新的“桃园三结义”。他们均为 1977 年生人，眼下正好 40 岁上下，与我等 50 后，属于两代人。他们在“文革”混乱结束后出世，应该算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到他们稍稍懂事的岁数，市场经济又恰好在中国破土露芽。与品尝过三年自然灾害饥饿、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父辈相比，他们是崭新的社会环境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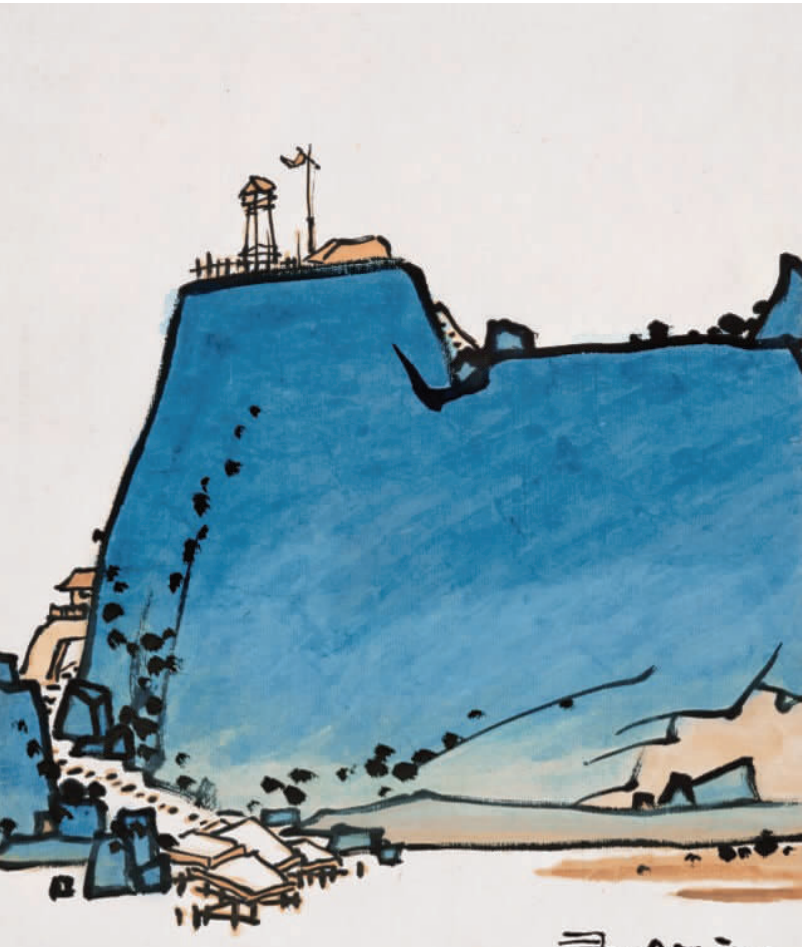
我写小说，一般写自己很熟悉的人物故事，提笔心中有底，不怕露出破绽。写同龄人，自然得心应手，写老一辈，也大体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比如知识分子圈里的男男女女。若想写比我小二三十岁的一代，眼下 40 来岁的一代，内心的准备不足。尽管我儿子也 30 好几了，我却从来没有写他的念头。当父亲的，眼力往往可疑，居高临下为常态，总把自己的孩子看得过分幼稚。

偶然的机会，与年轻的朋友们聊天，是个所谓的当代青年精英，MBA 毕业后，均谋得令人羡慕的高薪职位，属于有豪车，住别墅的圈子。他们谈吐不俗，不扯无聊的段子，也不说商战及股票玄机，倒是关注社会思潮或者文化方面的新鲜话题。观点未免南辕北辙，与当下微信朋友圈的境况相仿，只是不见脸红耳赤的争辩，品着咖啡，悠然地各执己见而已。那种成功人士超然的自信，既无大小会议上听惯的陈词滥调，也无街头巷尾流行的恶言俗语，顿时让我耳目俱惊：这是中国社会孕育出的全新的一代人么？

那天，有位某著名跨国公司高级白领的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会儿，他们讨论着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向，他

创作谈

众所周知，大别山是一块神奇的土地。1930 年代初，这里拉起了一支如雷贯耳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这支队伍从大别山打到大巴山，从祁连山转战太行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这支队伍为主体组建的部队屡建功勋。大别山区



潘天寿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资料图片)

小说《鲜花岭上鲜花开》寻找散落民间的中国革命故事

向沉睡的英雄问声好

徐贵祥

有红安、麻城、金寨、六安等将军县，六安境内有一个独山镇，家家有烈士，村村有功臣，全镇 16 名开国将军，被称为将军镇。

本世纪初，我回乡探亲，一位前辈带着我遍走皖西山水，一路上给我讲大别山的故事。有次，他指着正在

村头闲聊的多名老汉对我说，这些人里面可能就有老红军，当年参加革命，甚至成为连长、团长、师长，后因种种原因隐姓埋名的大有人在。前辈的话让我震惊。从那时起，我重新回过头审视我的故乡，开始了寻找。寻找往日的岁月，寻找当年的足迹，寻找散落在民间的中国革命故事。

在金寨的金刚台，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主力撤退后坚持战斗而被打散的一个排的女红军，在山洞度日并坚持战斗，她们最后的身影消失在一场战斗中，从此无踪无影。可是，在我的感觉世界里，她们并没有消失。有时候，面对西天燃烧的晚霞，我会看见她们；行走在水库浩瀚的水面上，我还会看见她们。

2015 年夏天，我到霍山参加会议，当地负责人介绍情况，一处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很早离开了大别山，他的家人则一直在家乡从事基层革命工作，他的母亲是列宁小学的校长，而最早在农民夜校教唱《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教员，就是他的妹妹。

回到北京，我找到一本《金寨红军史》，想从里面找到那个母亲和妹妹，我想知道她们最后的命运，但我未能如愿以偿。或许，大别山里有更多更有价值的故事，她们被忽略了。欣喜的是，就是从那本书里，我发现了一张《土地革命时期民主建政示意图》，令我浮想联翩。实际上那是一张苏维埃建设规划图，我从图上看到了规划中的流波市区、列宁中学、图书馆、电影院、拖拉机厂、集体农庄、飞机场……也就是通过这张图，我对“中国革命”概念产生了新的认识，我看到了一代人的理想信念，看到了早期革命者的初心，重要的是，我感受到革命同文化、同文艺、同文学的关系。设计绘制这张地图的那群人，不仅是革命者，也是文化人，那张地图不仅显示了政治理想和军事谋略，还长久飘动着浓浓诗意。

当年暑假，我又回到大别山区。细雨蒙蒙的上午，我们乘坐一艘快艇在响洪甸水面上游弋——这个水库，是皖西人民第二次奉献的成果。1949 年之后，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党和政府组织大兴水利，皖西淠史杭工程星罗棋布，大别山区建起了多座水库，当年红军规划中的“流波市”隐身响洪甸水库。我心中五味杂陈，选择了一个角度，将船头那面徽徽作响的五星红旗拍摄下来。

这次寻访归来，我的手机里一直保存那张照片，每每看见它，我就想起那首产自我的家乡、流传于中国革命征途、影响世界的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呀飘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这是为了庆祝苏维埃成立而作的歌，在这喜庆的旋律里，我一直在想，那座想象中的苏维埃城市真的被淹到水下了吗？当年那些扎着绑腿的红军到哪里去了呢？我甚至想象，他们的灵魂并没有离开，也许就在水下行走，住在他们设计中的房屋里，那里真的有图书馆、电影院，还有商铺和茶馆，他们在那里喝茶听戏，打量着水上近崛起的城镇，看着一代又一代后人生生不息。

2016 年暑假，我在脑海里写下一个标题《飘呀飘起来》。在构思的过程

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在我的眼前一一浮现，皖西革命的英雄许继慎、舒传贤、周维炯、旷继勋……当然，最让我心动的，还是鄂豫皖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沈泽民，那个小个子，大胡子，矛盾的弟弟。我之所以对他格外关注，不仅因为他有一颗敢作敢为、严于律己的赤子之心，还因为他是文学家。从沈泽民的肩膀看出去，我又看到了许多牺牲在革命征途上的文学家，比如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

我感到，我已经找到我的主人公了，我的英雄理想和革命信仰，都将通过这个人物闪亮登场，他的名字叫韦梦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这个名字可能有太多的元素构成——一句话说到底，这个人物，是一张新面孔，作为文学家的革命者，同时作为革命者的文学家。

我设计了一座古色古香的文化名镇，以它的百年历史为结构主线，以韦梦为的传说、韦梦为继承者的故事穿插，营造出虚拟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创作空间，试图走进历史的纵深，去探询革命与文学、革命与人性、革命与爱情的关系，也许这些理性的思考能为作品引导向一个更大的目标，谁知道呢。我敢说的是，在构思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尽量地还原一个作家的真诚，真诚地认识革命，真诚地对待文学，真诚地写小说。

最后要说明的是，尽管多少次热血沸腾，但是，这样一个想法甚多、灵感甚多，冲动甚多的小说，真的写起来，还是举步维艰，屡写屡改，山重水复，走走停停。进入那个神奇的世界，我的耳畔就会不断响起前辈的话语：皖西的一草一木都有故事，一个年迈的农民都有可能当年的红军或者八路军的英雄。那是一片可以无限开发的文学土地。

就这样写了一年多，还仅仅写了个开头，好在已经成形了几个人物。开头部分韦梦为并没有出现，他只是作为一面旗帜在作品的上空飘扬。作品最初出现的人物叫毕启发，他就是那些被忽略、被淹没、并且被误解的人物之一。但是，英雄就是英雄，青史无名更见英雄本色。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当水落石出，毕启发的英雄形象冉冉升起的时候，这位老人，用仅有的清醒说出最后一句话：“还有三个”。

还有三个，还有三十个，还有三千、三万、三十万……我们不可能擦亮所有的英雄，但是，我们必须擦亮我们的心，用文字，用文学，表达对英雄的敬重。发现英雄，书写英雄，呼唤英雄，是我的职责所系，也是我的理想信念。作为被人评价为“正面强攻”的军事文学作家，我为自己又发现超出经验之外的战争和英雄，感到由衷高兴。

当我把这部中篇写好，我似乎看见大别山的沟壑里，几大水库的水面下面，那些英灵从沉睡中走来，集结在鲜花岭上，那首当年的歌声在头顶上方飘荡——“鲜花岭上鲜花开，花开时节红军来，红军来了为百姓，平等世界人是人”。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之际，我把这部中篇命名为《鲜花岭上鲜花开》，发表在今年 8 月号《人民文学》上，谨用此作品向我们伟大的军队献礼，也向那些沉睡在大山深处、历史沟壑的英雄送去一声真诚的问候。

（作者为知名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以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获茅盾文学奖）

第三只眼看文学

将军驰骋岂止在战场

——看《朱增泉散文与随笔》

潘凯雄

知道将军其名始于他的文字。还是在 2003 年那场为时只有 40 天就以伊军全线溃败而结束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尚在进程中时，就在报刊上陆续读到《看懂新一代战争》《巴格达的陷落》《伊军之败》《萨达姆的雄心和悲剧》《悲情萨哈夫》等一组对这场战争进行追踪与分析的散文，反应速度之快虽不及电视直播，但分析之到位却是远超当时作为嘉宾出现在屏幕上的那些个军事点评专家。于是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朱增泉。

认识将军其人则缘于我的一次“冒犯”。由于喜欢将军其文，于是在某年年底就擅自将将军的一篇散文收入了我为某出版社编选的一本“年度最佳随笔”中，不仅事先未征得将军授权同意，而且该书在生产过程中又出现了“虎头蛇尾”这样低级的技术错误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接到将军自报家门的电话时才深感“罪莫大焉”，手足无措之际，大度的将军却并无任何指责，只是提醒该书如果重印别忘了改正过来。

再往后，和将军就成了“忘年交”。在我还是出版人期间，有幸出版了他洋洋五卷本的《战争史笔记》以及《朱增泉现代战争散文》。最近又收到了将军惠赐的分成历史、人物、战争和游记四卷的《朱增泉散文与随笔》，总计百余万字，更使得自己有机会完整地拜读了他

的大部分创作，而读后率先在脑子里蹦出的就是本文标题上的那几个字——将军驰骋岂止在战场。

的确，1939 年出生的朱增泉是地地道道的军人，20 岁入伍，从士兵到将军，五十余年的军旅生涯，参加过老山轮战，担任过某集团军政委、总装备部副政委等。不仅如此，这位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朱增泉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自学成材者，读他的诗看他的文，无论是文字之讲究还是知识之宽广都的确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仅有高小文化程度者之手，因此将军也时常戏称自己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这恐怕既得益于部队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更在于他长期孜孜不倦的自律与修炼。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将军后半程的军旅生涯差不多就是职业军人与业余

作家的混合物，也正是由于这种交集，在将军的散文随笔写作中，落笔处大抵非武即文、以武为主，文武之道浑然一体的特色格外显著；取材于武时彰显文道，取材于文时则英气盎然。

就我个人阅读喜好而言，更看重朱增泉有关战争与历史题材的散文与随笔。关于战争题材的散文随笔，将军的落笔基本上集中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和那场肇始于 2011 年的突尼斯而迄今尚未消停的国际事件中。其实说这两场“世界波”的人和文并不少，但将军说起来三个特点则又是他人所不具备的，即一是内行，当我们看到电视上的一些军事专家还在那里一脸懵懂地喃喃着“看不懂”时，将军却在那里条分缕析地一一道来，这就是将军的本色；二是视野，将军说战事，大都不限于一国一战，而

是纵横捭阖上下腾挪，由一国之于一片，一战之于一略，这也是将军；三是晓畅，全是大白话，识字大抵就能读懂，这还是将军。而关于历史题材的散文随笔，大都选材于长达五千年华夏历史长河中的那些大起大落、大分大合的片段与节点，以及置身于这些个特定情境中的特定人物与特定事件，进而阐发若干今天仍需关注的历史规律。比如那篇《凭吊一处古战场》，虽落笔于现位于太行山麓井径县境内的楚汉之争时那场著名的“背水一战”之发生地，实则墨重于那位军事天才韩信之一生，既展现了他在不同战役中的辉煌，更剖析了韩信从“一败请立齐王”到“再败改封楚王”直至“三败长乐宫”这样一条悲剧历程。而在这样一段历史进程中，不仅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刘邦、韩信和萧何三位历史

人物，更是将军事思维与政治思维之别给揭示得淋漓尽致。

其实又何止是战争与历史题材，将军笔下的人物与游记题材同样鲜明地体现出这种亦文亦武的个性特征。以“人物卷”所选各篇为例，除去开头几篇大抵与将军的工作和交往有关外，其余进入他视野的那些个人物，无论中外与古今，同样都是一些置身于重大历史节点与事件中的风云人物，同样是立意高远、叙述与思考相结合，既让读者了解其人风云跌宕之命运，更令人体味其命运背后的偶然与必然。《朱可夫雕像》一文便是其典型代表之一。既然以“雕像”为题，文章便围绕着重三座青铜雕像展开，第一座位于莫斯科红场北端出口处外，朱可夫骑在马上，表现出一代骁将赢得战争走向和平的瞬间神态；第二座

是在离莫斯科 1700 公里之外的乌拉尔军区司令部大楼前，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朱可夫的被贬之地，与红场处的那尊雕像相比，同样是一身戎装，同样是骑在马上，但人与马的姿势神态则充满了剧烈的动感，折射出一代名帅内心的躁动；第三座雕像则是在莫斯科俯首山卫国战争纪念馆内，元帅神情严肃而平静。三尊雕像大抵表现出朱可夫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个人的命运：这注定只能是战场上的一位胜利之神。

如此立意我不禁要武断地说：这恐怕只能出自军人出身的朱增泉之笔下吧。

尽管将军自谦：“对于写作，我是一名‘票友’”，但读毕朱增泉这百余万字的散文随笔，将军驰骋岂止在战场的形象挥之不去，将军文章岂能无军魂的印记更是深深地烙在心中。在编选完这四卷本的《朱增泉散文与随笔》后，将军又一次自谦地说：“我自知老之将至，创作激情大减，整理这些零零碎碎的文字，大有‘打扫战场，鸣金收兵’的意向”；而在和我的通信中，将军更是不无伤感地写道“我写不动了！”初闻斯言，我也不免受将军情绪之感染，但现在作为本文的结束，我想告诉将军的是：无论您是否继续写下去，中国当代散文随笔创作的历史上都会留下您浓墨重彩的这一笔！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